

不同文化的非理性特征 与国际文化交往

□ 潘一禾

内容提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国文化的非理性特征进行了明显的“误判”，中国式“无神论”、实用理性和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以及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但从自我反思的角度看，国际文化交往中的中国式非理性言行也可能带有偏狭和狂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需要各自有“文化自觉”和反思意识。反思意识首先可以将文化的差异感和相互不满从情绪性的宣泄引向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相互审视。其次，文化的自我反思以及反思成果的交流，可以帮助和促进文化间的谅解和合作。再次，通过自觉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盲区，都会出现行为模式不同的非理性狂热，谁都不可能单独地引领未来的世界文化主流，并且还需要相互制约和清除“可怕的错误”才能共同继续生存下去。

关键词 非理性 国际文化交往 文化自觉

作者潘一禾，女，1959年生，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杭州 310027）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或目标，并且有权力追求自己的目标或重心。英国学者刘易斯说：“文化是为成功和生存而谋划的。如果我们活着、健康、有经济能力，就不能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特有的行为准则。”^①正因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间存在着某些差异和相似的自信，所以对“国际文化交往”问题的讨论就包含着一种矛

盾和张力。这个问题既是讨论整体主义的，也是讨论个体主义的；既是论述观念的，也是论述实践的；既是有非理性成分的，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亨廷顿对中国文化之 非理性特征的“误判”

若干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

第108页。

⑥⑦朱红文《社会科学方法》，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2～97页。

⑧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⑨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⑩转引自列维·史密斯：《艺术教育：批评的必要性》，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⑪艾斯纳《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发展》，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⑫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责任编辑 尹之

廷顿最初发表他的“文明冲突论”时,曾把冷战后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敌人归结为两个方向:其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另一就是儒家文化圈的权威主义。但后来他改口说:即使真有所谓“中国威胁”,那也不可能是在公元2010年,而是在2050年甚至2080年之后,也就是说,目前并没有发现冲突迹象。其他一些媒体所说的“中国威胁”主要是指经济贸易上的竞争激烈,而非价值观上的相互抵抗。

相比之下,当前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对立冲突却历历在目,仿佛多少应验了一点亨廷顿的说法。这种冲突的原因除了历史积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巴以问题上的极度意见不和)、反全球化运动中的“反西方化”和“本土化”浪潮外,也可能与伊斯兰文明的特性有关。亨廷顿的改口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了儒家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在对待信仰和价值观的态度有明显不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具有实用理性的传统,而伊斯兰世界则习惯对信仰和价值观采取非实用对待。宗教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信仰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人之最高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是不能被用来实现任何功用和实利目的的,这种精神空间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本文明与异文明发生碰撞、外来文明给本土文明造成压力时,伊斯兰世界可能的排异反应会更强烈,因为它抵抗的目标不会直接指向实际权力和利益,这类价值观的非实用对待方式,会更强调一种精神和心理空间的自我捍卫,个体甚至必须为之献上生命和一切现实利益。程光泉先生在《全球化与价值冲突》一书中写道:对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某些人来说,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可以被随便打扮和使用,成了实现利益目标的一种实用工具。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另一一些人来说,为了虔诚的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是十分正常的,宗教之争,信仰之争,未必需要以物质利益方面的动力为基础。应该看到,对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差别,本身就构成文化上的反差,也构成政治争端的一个重要来源。^②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虽然有丰富的价值观内容,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传统也帮助我们更顺利地融入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在中国人的历史传统中,民族权益和国家利益虽然极其重要,但基本是

一种现实主义的权力诉求,其内在的底蕴有“天下大同”的道德理想,但其实践的根基则是实用理性和合目的性。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现实的国家目标,所有的事物——浅至日常物用、深至文化伦理,一直都在不断变通和调整。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既崇高又实用的精神活动,因而在中国文化的理念中,强弱文明间、国家间、民族间的斗争固然不可避免,然而学习、借鉴强势文明,甚至不惜“彻底改造”本土文明,却并非绝不可以。受中华文明影响的诸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都在以西方为师,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体现了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

概而言之,儒家文化圈一直对宗教采取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对待和利用方式,伊斯兰文化圈则对宗教一直实行着非实用对待方式,基督教文化圈采取的是理性与非理性两者结合的方式,而且多元派别宗教使其结合的方式还不止一种。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伊斯兰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圈有一些磨擦和冲突,但他们过去有过密切接触,将来也可能有更密切和谐的合作;儒家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圈之间不易发生冲突,同时也在合作的过程中可能停留于表面和器物层面,真正在精神和价值领域则彼此还缺乏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圈对基督教文化圈的了解又多于对伊斯兰文化圈的了解,所以儒家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对话和合作目前也主要是表层或以物质层面的互惠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先生撰文强调不同文化在非理性思维上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亨廷顿理论的启迪与谬误》^③一文中说:政治学家亨廷顿一直对社会科学仅用“理性选择”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历史和政治行为抱有怀疑。如果说国家和政党作为一个政治机器有时还会失去理性的话,个人和非政府的团体就更容易做出“9·11”那种丧失理智和违反人性的事情,从而灾难性地改变历史进程。亨廷顿作为一位保守的基督徒,更能以自身的宗教体验解释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行为的非理性思维。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一些批评,集中于两点,一是利益冲突才是冲突根源,二是亨廷顿鼓吹西方文明的普适性。这第一种反对意见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里,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经济决定论和利益、权力决定

论容易深入人心,对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认识。第二种反对意见则是误读,亨廷顿的本意是强调西方文明不具有普适性;“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亨廷顿论证中国将会同穆斯林世界联合反西方的论据有四点:一是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冷战后中国领导人和官方文件有关国际政治的基调,是美国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西化”和“分化”中国、中国应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斗争;三是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国家期待中国同它们联手反美;四是中国和朝鲜都向伊斯兰国家输出了后者从西方得不到的先进武器、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王缉思先生对此评论说:从形式逻辑上说,亨廷顿的推理不能说很武断……但这不过是一种“误判”。“亨廷顿有关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误判,根子在于他是用一种宗教非理性的眼光去观察日新月异、利益驱动、技术至上、无神论为主流的另一种现代文明国家。亨廷顿等人大概很难理解,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衰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中国的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

王缉思先生的文章反驳的是亨廷顿“儒家—伊斯兰教轴心”担忧的推理错误和主观误解,强调中国式“无神论”、实用理性和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以及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这些反驳是在理的,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反驳还主要是一种诚恳的“解释”或“说明”,一种强调差异的文化相对说。

二、国际交往中的中国式非理性及其“文化自觉说”

从“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相对说”就被中国

知识界广泛认可,对中西方文化的品格及其差异进行讨论和比较的文献和出版物可谓汗牛充栋或浩如烟海。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对“五四”以来的各家观点进行了以下归纳: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智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伦常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文化;中国文化重人文精神,西方文化重科学精神;中国文化重伦理精神,西方文化重宗教精神;中国文化重统一性,西方文化重差别性;中国文化重直觉体悟,西方文化重逻辑分析,等等。由此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下品格: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等等。^④其他名家之言如梁漱溟说: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性的,中国生活中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感觉)的。^⑤金岳霖说:中国讲君臣伦常,印度讲来世超越,希腊讲设问求知,因而中国文化具有“此世性”,印度文化具有“他世性”,希腊文化具有“超世性”。^⑥他们都运用博学之才证明中西文化、中印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王缉思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向亨廷顿先生解释了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差异或完全不同。

宗教或集体信仰一直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今天,以宗教界定的文化、文明概念很难与民族主义或国家概念完全分离,它们的一种相关性突出体现在“非理性思维”方式上。可以说,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缺乏宗教传统或只有儒学这种“准宗教”的国家,其文化传统中的非理性思维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和文化间冲突的持续性和剧烈程度,并不亚于政治军事大战。例如在中国晚清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到处都可感受到为维护古老精神家园和文化古国而不惜决死一战的悲壮气氛,其中也不乏“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和反文明举止,香港的历史教科书就更清楚地写道:当时(八国)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也‘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

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⑦

所以我们也从对文化进行自我反省的角度,关注中国人在国际交往中的非理性思维特征及其表现方式。

首先,中国式无神论特征是“神”因“灵验”而神奇,人们普遍对“神灵”采取一种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人神关系是双向的、有条件的、可交换的。当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时就信仰,一旦发现这个好处不明显或不在眼前就可能毫不犹豫地放弃,或在迫切需要时又“临时抱佛脚”或改信另一个神灵。出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可能的合理自恋,中国人容易觉得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自己的弹性、通融度和灵活多变是更入世和务实的,中国式对道德的普遍尊重和信仰是一种更积极的“入世”价值观。但这种在神灵面前可以讨价还价的自由度使得中国人普遍对他人的坚定信仰和为信仰而战也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更容易看出人家价值观“口号”背后的“利益”贪婪和“权力”野心,对其他宗教文化对未来的执着探索评价不高,或对其“终极目标”准则采取审时度势的旁观态度,更希望在双方相互尊重各自信仰的前提下,允许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现世生活和现实利益。这种表现反过来又可能引起其他宗教传统国家的人们不解、不屑、警惕甚至敌意。

其次,中国人很容易将自己的国内社会交往习俗推行到国际交往之中,这就是“同心圆”式的等级制和封闭性。虽然在正式外交文本中早已声明了“一切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立场,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仍隐约存在“落后了就要挨打”、“强大的必然称霸”的潜在思维逻辑,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忧国忧民”。中国人习惯于在经常给世界强国“排座次”的过程中,不加思索就同情“硬实力”上的“弱者”,不探明真相就视“敌人”的对手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会经常思量自己所处的“险恶”国际位置和可供选择的最佳生存发展策略,而不常在国际社会规范的遵守和建设历程中比较自己与他者的选择、努力和影响。即使在被他人这样比较和研究之后,也总能强调总结许多自己的现实困难和独特国情,从而很容易在公开场合,给信息流通的异国人民留下“另类”印象。

再次,中国社会环境和话语语境中“个人”或

“私人”状态往往是贬义的,这使得许多国内问题导致的个人不满情绪,往往借集体的名义在国际问题上任意宣泄,尤其在痛骂境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时候不仅安全无虞、不骂白不骂,而且还顺便获得“爱国爱族”的美名,于是常常在中国的网站上出现规模惊人的“反×”统一战线和众多的怒发冲冠之颜。因为中国人在将个人私心和狭窄之心扩大到自己所属的群体或融入到自己所属的“公利”的时候,就可能变得毫无疑问、义愤填膺、理直气壮、无所顾忌,因为“我这是为了国家”、“我这是为了大家”。这方面的集体非理性行为,虽然从事实上讲,也许不过是少数,但如果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学调查数据和文化批评,则很难让“他者”们听之任之。

第四,中国人对真理的追求常常是将之伦理化,从而也就将之情感化。中国人因国际问题引发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当真不行,当真了仿佛也不必。如果真有人问某个他认识的网民:你怎么会认为萨达姆是反抗美帝的民族英雄呢?他也许立即希望你一笑了之。也就是说,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国家与异国发生意见分歧时,容易先主观判定善恶,却不花任何力气去追究事实,先考虑“该不该”,却可以不了解“是不是”。等最终事实出来的时候,可能又没什么人愿意去知道那些复杂的真相了,毕竟外交事务对中国人来说,大都是政府和外交部的事。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向亨廷顿解释清楚和具体证明我们与伊斯兰结成反美联盟的可能毫无可能,我们也不能因此不反思我们文化中的非理性思维特征及其正负影响。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文化惯性和潜意识都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如果我们衷心希望“从不尊从一神论的中华文明,可否成为最宽容大度的一种文明”^⑧,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已有的文化遗产使得我们离这个辉煌的目标并不比其他民族和国家更近。

当代中国的一些文化名人如费孝通、季羨林、王蒙等先生曾多次提出加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大国”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季羨林先生说:“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不管你是否同意,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⑨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了‘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怀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必须在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如何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必须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跨文化交流’。”^⑩王蒙先生说：“我们说的文化大国的建设，绝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更加开放地吸引、接受、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有益的东西。越是文化大国，越敢于吸收各种与你的文化不相同的东西、有益于你的东西。……能够吸纳世界、交流世界、包括碰撞世界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我们应该是一个更有道德、更君子的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在这方面的情况与我们的传统、地位太不相称了，建设文化大国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理想，任重而道远。”^⑪

三、文化间相互理解需要各自有反思意识

人类自古以来都主要以三种形式、三条途径把握和对应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主要从事三种辛勤的劳动：认识自然（改进物质生活）、组织自己（完善社会生活）、认识自己（提升精神生活）。人们对自然和客观世界的了解都是一种目的性和工具性思考，是外部知识体系，这类思考促进了工具的改进和环境的变革。人们对自我和文化的反思，则是一种价值论思考；环境的改变和工具的改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会必然导致人的自我认识的加深，观念性知识的积累和有效运用，需要人类不断地相互对话、自我反思、再一次地反省和自我反省、批判和自我批判……所以，对国际文化关系的认识 and 把握，不仅需要认识外部世界（国家、社会、团体和人等），也要每个参与者的自我反省，对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制度导向

进行反省、调整和改进。我们可以通过国际间、组织间和人际间的文化交流，实现或推进这类认识和反省。

以赛亚·伯林在谈到以色列问题时回答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鲁格说：“以色列在政治上有许多重大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以色列政府犯了可怕的错误。我不是沙米尔先生、沙龙先生或贝京先生的支持者。我觉得他们在文化上、道德上、政治上和物质上都极大地损害了以色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当然要和解。和解是对的，不是不必要的，而是迫在眉睫的事。要努力达成积极的协议。要理解反对自己的人。”^⑫

2002年6月，联合国发表了《2002年阿拉伯人权报告》，报告开头就说：“从大西洋到波斯湾，人民——妇女、男人与儿童——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财富与希望。”令世界哗然的是，这份由阿拉伯知识分子完成的报告得出了与“偏狭的、充满殖民罪恶”的西方知识分子几近相同的结论：阿拉伯的强权政府与文化传统窒息了人们的创造力，阿拉伯人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而非一味指责以色列和美国。“这并非外人在考察阿拉伯国家”哈拉夫·胡奈迪女士，49岁的约旦前副总理对这份报告评价道：“这是阿拉伯人自己做出的决定。”将近三十位阿拉伯人士在2001年初开始了这项研究，试图找出“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世界为何落后”的原因，而“9·11”事件使这一举动备受瞩目。

“一半人口被剥夺了创造欲与生产力”，报告如此分析包含22个国家、2.8个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在过去20年中的停滞状态——它的人均收入在下降，尽管阿拉伯世界的生活水平、人均寿命仍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广泛的慈善业削弱了相对贫困度，但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石油的收入，而非真实的发展状况。在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政府治理、知识流动和人才创新上，阿拉伯世界却表现糟糕。从沙特阿拉伯到埃及，威权统治盛行于阿拉伯国家，剥夺了政治和舆论自由。政府不希望人民独立思考、自由交流。“9·11”事件后，埃及电视台与报纸反复报道“这是犹太人的阴谋”，挑动民众对以色列的仇恨，却对于自身的腐败或是公开选举只字不提。“巴以冲突”已经成为延迟民主改革的借口。出生于巴勒斯坦

的胡奈迪女士说。阿拉伯知识分子往往发现自己最终成为狭隘的宗教思想与政府的敌人,互联网使用率非常低,电影生产也呈衰落趋势。正如赛义德所说:“流亡是我们的宿命”。中国学者许知远先生也对此评论说:“我们无法指望一个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国家拥有持久的增长力,而自由反省的前提是个人精神的充分觉醒。……开明的政府与觉醒的文化之间需要相互配合。”^⑬

文化间相互理解需要各自有反思意识,而这种反思意识首先可以将文化的差异感和相互不满从情绪性的宣泄引向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相互审视,意识到不同文化间的某些差异,如果得不到应有的解释和说明,得不到细致的区分和定性,或者如果得到了不应有的离间和挑拨,也会不断引发流血的政治冲突。如程光泉先生所说:“亨廷顿如此突出精神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常常因缺乏实证分析而受人批判。”但是,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文明价值观,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统统不过是争权夺利的工具和幌子,也许比亨廷顿偏离真理更远。^⑭

其次,文化的自我反思以及反思成果的交流,可以帮助和促进文化间的谅解和合作。王逸舟先生谈到所谓“中国威胁论”时说:在新的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之最重要的途径,是靠我们自己去“去弊除疾”、“强身健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主要的威胁不是外部某个想要灭亡中国的敌人(不论它是否存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而是自身的隐患和缺失,是这些隐患和缺失可能诱发的政治失序、经济停滞、社会动乱、民族冲突、地方分裂主义等危机。国家安全、国家主权等核心范畴,用新的角度和发展眼光衡量,均不可离开自我反思的过程。安全和主权绝不仅是对外防范性概念,更要有(对内)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内涵。^⑮每一种文化团体都需要作出这样的反省和自查,澄清自己所属文化在他者心目中的“一体”印象,从而为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对话留出可能性空间和协商谈判的余地。

再次,当代各国间的跨文化对话确实经常性地会遇到有的文化团体不具有反思意识、或能代表某种文化的国家政府、知识界或具体个体不进行反省的情况,甚至会频繁遭遇“单边主义”和“你死我活”式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依然要坚持呼

吁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开创不同文化的“反思”可能。因为通过自觉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盲区,都会出现行为模式不同的非理性狂热,谁都不可能单独地引领未来的世界文化主流,并且还需要相互制约和清除“可怕的错误”才能共同继续生存下去。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所说:“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个根本关心之处,那就是把历史的经验加以重新组合而生的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种关心自然会使命它们趋于一致。”^⑯

注释:

①[英]理查德·D·刘易斯著:《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程光泉:《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197页。

③⑧王缉思:《亨廷顿理论的启迪与谬误》,《世界知识》2003年第9期,第8~12页。

④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页。

⑤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63页。

⑥转引自许国璋著《论语言和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5~216页。

⑦转引自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

⑨季羨林等:《21世纪中华文化专家谈》,《精神文明建设》2001年第1期,第2~3页。

⑩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与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第3页。

⑪王蒙:《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大国建设》,光明日报2002年1月9日B1版。

⑫[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⑬许知远:《我们为什么落后》,载许知远主编《后9·11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⑭程光泉:《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⑮王逸舟:《世界政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⑯转引自郝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责任编辑 尹之